

大国大时代

中国经济十月谈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编

改革谈 大国经济该从哪里升级？
价格谈 物价涨到何时休？
增长谈 增长的极限到了吗？
农村谈 农民与土地是历史性说再见了吗？
货币谈 大国的钱怎么办？
就业谈 明天的工作在哪里？
生意谈 中国和世界如何谈买卖？
房价谈 房价需要多少个配套窗口？
博弈谈 啥时能买得起房子？
社会谈 中央和地方事谁干？钱谁出？



看书扫这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和阅读方式：

编辑短信 搜大国大时代 发送至10658080
手机也能随时随地阅读本书

CNR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经济之声

大国大时代

中国经济十月谈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国大时代 /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编. —— 北京 :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035-5067-6

I. ①大… II. ①中… III. ①改革开放—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2280号

大国大时代

责任编辑 严宏伟 邹懿男 邱 然
责任校对 马 晶
版式设计 北京彩眸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 天津市迅龙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邮 编 100091
网 址 www.dxcbs.net
电 话 (010) 62806298 (编辑部) (010) 62805824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彩眸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 183千字
版 次 2014年4月第一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4
定 价 50.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序 | Preface

为迎接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2013年10月主办了“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十月谈”系列时事报告会。这十场报告会以“助威大国经济、树立大国信心”为主旨，受到广泛欢迎。本书以现场实录的方式，向广大读者呈现这个系列时事报告会的内容。

发生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经济深受影响。即使在5年后的今天，美国经济复苏尚待时日，欧洲经济持续低迷难以自拔。中国政府虽然采取了及时、有力的应对措施，最大限度地减轻了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严重冲击，但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难以独善其身。经济增速减缓，结构问题凸显，外贸面临困局，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揽全局，审时度势，决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以国家电台的主流视角，着眼中国经济发展大势，把握全面深化改革大局，首次采用广播和全媒体系列报告会与受众互动方式，连续推出十场“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十月谈”时事报告会，对当前经济形势做出全面理性的分析判断，唱响中国经济主旋律，帮助公众“看懂”中国经济、“读懂”中国经济。

“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十月谈”系列时事报告会邀请厉以宁、龙永图、姚景源、李扬、刘伟、蔡昉、宋晓梧、温铁军、夏斌、迟福林、张燕生、贾康等二十余位权威人士，围绕当前中国经济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各抒己见，从不同侧面深入解读和剖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领域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为公众了解和研判中国经济形势指点迷津，解惑释疑。这是很有意义的，也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也



体现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为国家电台应尽的引导责任。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只有加快转变经济方式，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经济指明了方向，而国际舆论还不时出现“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也有人还在渲染中国经济“崩溃论”。在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希望广大读者能够通过这本《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十月谈》，认清中国经济形势，树立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我们有理由相信，凝心聚力，坚定目标，抓住时机，攻坚克难，大国经济的航船一定能够乘风破浪，迎来崭新局面。

王求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

目录

Contents

- 
- | | |
|-------------------------------------|-----|
| 1 改革谈
——大国经济该从哪里升级? | 1 |
| 2 增长谈
——大国增长的极限到了吗? | 19 |
| 3 价格谈
——物价涨到何时休? | 43 |
| 4 就业谈
——明天的工作在哪里? | 59 |
| 5 货币谈
——大国的钱怎么办? | 72 |
| 6 生意谈
——中国如何和世界谈生意? | 101 |
| 7 农村谈
——农民与土地是历史性地说不再见了吗? | 125 |
| 8 社会谈
——改革需要多少个配套窗口? | 145 |
| 9 房价谈
——房子啥时买得起? | 168 |
| 10 博弈谈
——中央和地方，事谁干？钱谁出？ | 193 |

改革谈

——大国经济该从哪里升级？

改革开放30多年，大国崛起，经济腾飞，中国的经济奇迹引世界为之瞩目。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制造”已然成为这个地球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的标签，让国人心生自豪。

但时至今日，在很多行业，过去低附加值、低人力成本的模式正遭遇瓶颈；在很多地方，曾经大干快上的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已难以为继。比如，风靡世界的苹果iPhone手机，绝大部分都是在中国生产的，而中国企业所能获得的利润低得可怜，只有1.8%，和苹果公司相差30倍。

环顾世界，在金融危机之后的第五个年头，全球经济复苏之路仍任重道远。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出口受阻、外贸下滑、金融市场波动，波澜起伏。

2013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更是呈现逐季度下行的态势，一季度经济增长7.7%，第二季度增长7.5%，经济下行的压力扑面而来，已高速前进了30多年的中国经济列车走到了十字路口，换挡、转向大势所趋。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新一届政府提出中国经济要打造升级版。如今，再改革的步伐坚定有力，推进新型城镇化、设立上海自贸区、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等措施已经出台。正像李克强总理所说，中国经济奇迹正在进入第二季，后面的故事更精彩。

那么，中国经济奇迹的新篇章该怎样书写？种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又该如何起步？

报告人：厉以宁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

主 题：中国经济改革路径越清晰成效越明显

提 要：中国的改革从哪里开始？从产权改革开始。中国到现在为止，产权改革并没有结束，主要表现在农民没有成为市场主体。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法：在中国要完善、建立家庭农场制。有家庭农场制，就有家庭农场主，这就是中国未来农民的走向。要土地确权，在农村中进行大规模的新农村建设。

中国“人的城镇化”道路怎么走？中国必须走老城区加“新城区”加“新社区”之路。“新社区”是什么呢？就是建设新农村。新农村的房子已经盖好了，很多东西正在修建，最后会形成“新社区”。公共服务到位了，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了，用社区管理的方法来管理这些新社区。

中国要实行就地城镇化。必须给农民以产权，土地确权是新一轮农村改革的起点。

城镇化正在进行中，当前最主要的是怎样来升级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以生活质量提高为主，人要进城，就应该提高他的生活质量，对城市也有好处。

报 告 实 录

“当前的中国处在双重转型的阶段，这在全世界是没有的。”

当前的中国处在双重转型的阶段。什么叫双重转型呢？一是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二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双重转型是交叠在一起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已经有人研究这个问题，因为当时有大批亚洲、非洲附属国、殖民地独立。他们研究这个问题，很少涉及“体制转型”，而主要研究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即使提到“体制转型”，也是传统经济体制，就

是前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转为资本主义体制。

但中国现在所面临的状况不一样，我们是双重转型，不但要农业社会变为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而且需要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体制，而社会主义制度将继续存在，这在全世界是没有的。中国经济学家集体介入了这场大讨论，30多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学家悉数参加，人数之多，全世界也绝无仅有。

“中国的改革从哪里开始？正是从产权改革开始。”

我们研究的是双重转型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怎样实现工业社会，怎样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是摆脱传统体制。我们研究的不是传统体制，而是计划经济体制，这就是中国的特点。

中国的经济处在“非均衡”的状态，且非均衡的状态明显。中国属于“第二类非均衡”。“第一类非均衡”是什么呢？就是在市场不完善条件下存在的非均衡状态。中国的非均衡不是如此，中国的非均衡是在市场不完善而又缺乏市场主体情况下的非均衡，这就是“第二类非均衡”。西方国家出现的非均衡是市场不完善，中国还包含要重新构造微观经济基础的问题，要让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

所以，中国的改革从哪里开始？正是从产权改革开始。其中，国有企业首先要变产权，成为产权清晰的主体。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问题犹在。中国到现在为止，产权改革并没有结束，主要表现在农民没有成为市场主体，即使改了国有企业，中国经济又怎么能起来呢？

“有家庭农场制，就有家庭农场主，这就是中国未来农民的走向。”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法，就是中国要完善、建立家庭农场制。有家庭农场制，就有家庭农场主，这就是中国未来农民的走向。要土地确权，在农村中进行大规模的新农村建设。

中国的城镇化跟一般的城镇化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城镇化要新型城镇化，而不是过去的传统城镇化。传统城镇化带来了城市病，甚至在城市中又出现了反城市化倾向，因为城市污染了，社会资源不好，失业众多，所以有钱人从城里转向郊区、转向农村，而穷人纷纷进城。西方国家也认为，这个问题需要重

新探讨，这是新型城镇化遇到的一个大问题。

中国到现在为止，农村是农村户口，城市是城镇户口，这两种户口制度的存在，使得农民权利跟城市是不平等的。农民有身份的限制，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怎样来建设中国这个新型社会呢？这就需要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但这又引发一个问题，城市容纳得下吗？

现在中国的城镇化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是51%或者52%左右，但实际上，这把常住在城市半年的人都算上了，包括农民工在内，而农民甚至长达20多年的身份还是农民工，这就是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真正按照城市户口、农村户口来说，中国现在的城镇化率是多少呢？把农村户口的剔除之后，大概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几。假定再过几年，中国的人口到了14亿多了，也就是说要达到80%（按照西欧国家的标准），那就是12亿人住城里了。现在6亿，再挤进6亿，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是新问题，是其他国家没有遇到过的。

“必须给农民以产权，土地确权，是新一轮农村改革的起点。”

中国人城镇化道路怎么走？中国必须走老城区加“新城区”加“新社区”的道路。“新社区”是什么呢？就是今年建设的新农村。新农村的房子已经盖好了，很多东西正在修建，最后会形成“新社区”，公共服务到位了，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了，用社区管理的方法来管理这些新社区，这就是中国城镇化的一部分。

中国要实行“就地城镇化”。“就地城镇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农民不仅要进入老城区、“新城区”，还有“新社区”，这里也是城镇化的一部分。这样的话，12亿人口作为城镇人口，或者全国的户口都一元化了，才能够容纳得下，这就是我们大家遇到的大问题。大问题还有，必须给农民以产权。土地确权，是新一轮农村改革的起点。

去年11月底，我带了全国政协经济委调研组在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个市进行土地确权调查。那里的土地确权搞得比较早。我们看见，农民在放鞭炮。农民认为，自己有了宅基地的经营权证，有了宅基地的使用权证，有了房产证，兴高采烈。老人回忆说，跟当年土改完的情况一样，而且，比当时还热烈，鞭炮声到处都是。我们去的时候地上还有鞭炮屑。农民心里踏实了，他们扩大养殖业、种植业，愿意进城做工的做工，经商的经商，城乡收入差距大幅度缩小。

嘉兴有个县级市叫平湖，我们在那里开座谈会、做调研。嘉兴市的领导跟我们讲，在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是3.1:1；土地确权以后，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变为1.9:1。这个变化之大，主要是农民收入提高了。我们就问，农民收入怎么会提高呢？他回答说，农民有了产权就有了财产性收入，他们把土地转包出去，入股出去，同时又进城去打工，不是多一份收入嘛！

宅基地，我们在平湖市看到了。房子都拆掉了，都盖成四层楼高的房子。盖那么高干吗？出租。很多人是这样的情况，一层楼租给外来人开店、开作坊，二、三、四层楼自己住，自己人口没那么多，其中任何一层都可以出租。租给谁住？租给外地来做生意的人住，租给嘉兴市在城里上班的大学毕业生住。因为有多种收入来源，收入就增加了。

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土地确权之前要重新丈量土地，情况就不一样了。调查结果发现，丈量的耕地多了20%。我们当时就问，怎么会多了？农民也不隐瞒：

第一，当初承包开始的时候，地的好坏差别很大，所以，坏地两亩算一亩，好地一亩算一亩。经过30年的承包，土地都改良了，土地改良以后，这次丈量土地不管好坏全是一亩，没有坏地了，所以土地就多了。

第二，过去的田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有田埂，田埂不算在内；田埂两边被太阳遮住的，遮荫了，也不算。30年以来，土地已经变大了，要用拖拉机了，拖拉机耕地田埂碍事儿，现在田埂算入土地了，两边遮荫的部分没有了。

第三，就是当初有农业税，所以最后报地的时候，都普遍少报，我一亩三分地就报一亩，家家如此，少交税啊！现在土地刚丈量完，大家都公布了有多少地，想报少也不行，没有必要少报，要实报。因为，土地入股了，要分红了，土地少了自己吃亏，农业税也没了，有什么必要少报？所有这些情况变化，都说明农民成了真正的市场主体。

“收入分配制度的重点在哪里？重点应该在第一次分配。”

中国当前的收入分配制度，要重新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重点在哪里？我们在厦门调查后认为，重点应该在第一次分配，因为第一次分配是根据市场的

基础进行的。中国为什么土地进行第一次分配呢？有四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农民没产权，不确定他的财产，没财产收入，农民当然穷了，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受雇方和雇佣方双方地位是不对称的。不对称的情况下，出来打工的农民，城市孩子进入劳动力市场打工，都处在弱势地位，而雇他们的大企业是强势的。这种情况下，要改变双方的地位，西方国家走在了前面。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有工会组织。工会起作用的是能够保障低收入者的利益。中国到现在为止，你见过工会替农民工去要拖欠工资的吗？几乎没有。还得写信给总理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要改，真正让工会发挥作用，让农民工参加工会是必要的。

第三个理由是个体农民、牧民，卖蔬菜水果，卖奶制品的人等等，他们是弱势，在农贸市场摆摊位也是弱势，上门收购也是弱势，因为采购商、大超市是强势，由他们定价，这就造成了收入不平等。

我在荷兰、丹麦考察发现，他们有农民合作社，农民合作社有联社，这个一组织起来力量很大。他们有自己的车队、自己的船队、自己的仓库，再加上自己的码头，可以直接运到国外卖去；或者哪个大城市价钱高就到哪里卖去。中国的农民合作才刚刚建立，还都处在很弱的阶段，但一定要走联社的道路，这样的话，谈判力就加强了。

还有第四个理由，中国的教育资源配置是不均衡的。人均教育支出农村低、城市高，所以义务教育阶段，城市的学校房子好、师资力量强、设备齐全。农村呢？什么都差，这就造成了一个职业世袭的体制。农民工的孩子，初中毕业以后，考高中的录取率很低，进大学就更少，大部分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工，孙子将来也可能就是农民工。这种情况下去，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则，都需要改。这些都是初次分配的问题。

二次分配也重要，也需要调。二次分配怎么调？主要是靠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在西方国家，施行多年的福利政策有一条原则：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补。一次分配不足有差距，二次分配就通过税收、通过补贴、通过福利待遇把这个差距缩小了。而中国不是这样，城乡有两种户口，农民工享受不到很多城市工人的福利。比如医疗，城市的职工可以公费医疗，农民工却是合作医疗，合作医疗还是要交钱的。所以说，一次分配有差距，二次分配还扩大了差

距。这方面是全世界没有的，真的要改。

所以，我们说一次分配重要，二次分配也重要，但二次分配的重点在于加快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

“人的城镇化以生活质量提高为主，人要进城，就应该提高他的生活质量。”

城镇化正在进行中，当前最主要的是怎样来升级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以生活质量提高为主，人要进城，就应该提高他的生活质量，这对城市也有好处。现在国内的大城市普遍施行积分制，你在城里住，什么条件可以加多少分，你自己学历提高了，上了业余大学有加分等等，这都是有用的，但这个问题显得很迫切。

我在上海调查发现，几个相近的大城镇，现在跟过去情况不一样了。现在熟练技工、骨干工人都是农民工，进城20年，成了熟练技工，却留不住了。上海的竞争对手是苏南、浙江的一些城市，工业在发展，急需技术工人，到上海去挖，我这里给你户口，来吧，把孩子也带来，他就去了。这让上海着急了，技术工人跑了还有什么效率可言？所以推出积分制。但是，光有积分制是不够的，还要在城区改，一个区一个区的改，条件成熟就改，可以让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融入城市。但这种配套的资金是一个问题，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地方调查，一个普通的小县城，一个农民工的农村户口要转为城市户口，公共成本是10万块钱，全国平均数要比这个多。《人民日报》今年8月份报道，全国平均的农民工市民化的公共开支是13万块钱。哪里筹这么多钱？所以这就是我们下一步城镇化过程中为了提高人的质量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所有的双重改革的经验，体制的转型加上发展的转型，为全世界做出了贡献。因为，很多国家也正在走城镇化道路，它们不能只考虑到发展的转型，还要考虑到体制的转型。尽管它们的体制不是计划体制，但很多过去传统的思路也应该考虑在内。这将是一个重大的研究工作。中国经济学家关于这方面问题的研究成果，在国外发表得很早，大量的体现在国内的调查报告、国内的论文、国内的著作当中。中国为世界的经济学做了贡献，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能够双重转型成功，其中有中国经济学家的一份贡献。

现场互动

媒体记者：我是经济之声记者马尚田。关于新型城镇化，现在很多人期望很高，认为新型城镇化是打造经济升级版的一个重要引擎。但钱从哪里来？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地方负债非常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型城镇化的资金如何解决？

厉以宁：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中国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财权和事权是不对称的，很多是中央的财权多，而很多事情是地方做，地方又没有钱。我们不是流行一句话嘛，叫“中央请客地方买单”，事情好，我们就做，否则，我们就不愿意做。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需要改。

还有另一种说法，要实行“小政府大市场”就行了。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小政府大市场”这个提法就不准确，因为市场跟政府的关系不能用大和小来分别。在任何情况下，政府的工作人员人数相比全国人口都是小的。有人说，“强市场强政府”，这个“强”也不准确。

所以，我在文章里用的是“有效市场，有效政府”。有效政府，就是政府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有效市场，就是市场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政府能够做的，市场也能够做的，就要给市场做。政府该做的，就是市场所做不了的、做不好的东西，比如说，收入的再分配，这是政府该做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对落后地区的帮助，市场做不了，宏观经济调控做。这样，才能够摆正市场跟政府的关系。

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钱的问题、城镇化经费问题。要加快财税体制的改革，地方既然要做这件事，就应该出相应的经费。现在分税制的比例是1994年有的，实际上就到省为止，省跟下面地级市的关系，地级市跟县的关系都不明确，依靠什么呢？依靠讨价还价来定。所以，这是几次谈判定的标准，不规范的地方要改善它。另外，地方压缩经费，中央也应该压缩经费，压缩经费把钱给最需要的地方，这是当前需要的。我们要学习国外的经验，国外现在谈的比较多的是澳大利亚跟新西兰的经验，因为西欧国家的城市化，19世纪末基本都定型了，美国20世纪初也定型了，而澳大利亚跟新西兰的城市化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发展起来的。

还有一个什么新路呢？以城市为单位，建立城市公共建设基金。机构怎么建成呢？地方财政出一部分钱，各大金融机构出一部分钱，把这个架子先搭起来，架子搭起来就发行公共投资基金券，利率比银行存款高，比国库券高，你来买。我每个项目的钱怎么花的，全部公开化，市场运作。比如，这笔钱、这些基金券出来，是为了建自来水厂，建第二电厂，还要建某某公共服务设施……所有这些是一笔项目，你来买，可以转让，也可以分红，最后还有固定利息。用这些为大家筹一大笔资金，而且效果是好的。为什么？因为是市场化运作。除了非常必要的项目，大规模环境的治理，这些政府该投资的就要投资，凡是这种企事业单位型的，像刚才说的自来水厂、电厂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建，这就可以省掉一大笔钱。

在中国，现在的路是不能走了。现在有两个路子，第一个路子是卖地，卖地以前采用过，的确帮地方政府解决一些困难，但现在怎么样？没那么多地了，怎么卖？卖完了又怎么办？所以，这个要改掉。改掉以后政府还要花这么多钱，就是银行借债，地方债务中的60%以上，有的地方高达80%都是银行贷款，银行贷款将来如果还不上，变成坏债怎么办？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想办法，对于长期的债务，应该采取了断的形式。怎样了断？把它折成有中央担保的地方债券，地方债券期限就长了，它不是短期的贷款，这个可以再试行。地方政府一定要在债务的审核、债务的程序各方面都经过考虑，中央不要任意地为地方债务兜底，这是不规范的。现在跑项目，将来跑债务，你帮我兜点底，这对今后的规范化运作是不利的。

现场观众：厉教授您好！请问国企改革应该如何升级？国企改革的升级又体现在哪些方面？

厉以宁：我们首先要产业升级，一定要企业转型，企业不转型是没法实现升级的。这里要谈一个重要的问题，应该叫“国有资本体制改革”。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国有资本体制。就是说国资委，不直接管国有企业，国资委下面建立一些国家投资基金公司，它的任务是国有资本的配制问题。

经济学里面，有两个效率概念，传统的效率概念叫生产效率。生产效率是说投入产出的关系，一定的投入有更多的产出，效率提高了；一定的产出有更少的投入，效率提高了，这是一个传统。第二个，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现资

资源配置效率。前提是，假定投入为既定的，你怎么配制？假定用一种A方式配制，可以产生N效率；B方式配制可以产生N+1效率；用C方式配制，可以产生N+2效率，这样的方式投入不变，资源配置方式可以改变。

资源配置效率的结果在经济学中产生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是资产重组，是出效率的，因为它出的是资源配置效率，使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了，结构调整加快了。第二个变化，过去长期以来，把那些从事人事组织工作的、宣传工作的、行政管理工作的都叫做非生产人员。为什么叫做非生产人员？你没在生产第一线，不参与投入产出之比的变化，就叫非生产人员。资源配置效率出来以后，这个看法改变了，做人事组织工作的，从事的是人力资源的优化配制；做宣传工作的人是把每个投入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做行政管理工作的人是把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更好地结合在一起，都在从事效率的提高工作。

当然，这方面工作的人，会说我的观点旧了，都是30年代以前的观点。所以说，我们对于国有企业第一个整治就是这样的，管的是国有资本的配制工作，短缺行业该投入就投入，过盛的行业该撤出就撤出，过盛了还在这干吗？这样的话，有进有退。

再有一个整治是，国有体制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很多都是上市公司了，股份制企业了，就应该按法律来办。法律怎么办？《公司法》、《证券法》都规定了上市公司的责任，由法人治理结构来管理，建立股东会、董事会、总经理、监事会，这样就行了。这就是把国有企业推到市场第一线，所有的企业都是公平竞争的。

只有这样，我们的企业，国企、民企才能健康发展。国企要体制改革，民营企业要转型，民营企业的转型要有强烈的产权保护、自我保护的意识，也不能侵犯别人的产权，要有营销体制。改革重在服务，要有生产式的改革，重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还要有管理体制的改革。家长经营制能成为小企业，不能成就大企业，企业大了迟早要走股份制的道路。儿子不一定是接班人，他可以有股权，但接班人要挑选，要实行现代企业制度下的经理人制度，只有这样才行。

报告人：左小蕾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湖北银行独立董事

主 题：改革新动力来自进一步的对内开放

提 要：中国经济的前三十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第二季的中国经济要打造升级版。未来的经济发展需要改变什么？最重要的是需要有新的发展理念，需要培养、培育与第二季特征相适应的新的发展动力。

改革新动力之一，来自进一步的对内开放。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得益于两次较大的对内开放的动作：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第一次对内开放，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释放了巨大的劳动生产力，推动了农业发展，同时也支持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留向，推动了城市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的第二次对内开放，承认多种所有制共存，抓大放小，国企改革，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建立深圳特区试点，引进外资承接全球产业转移，鼓励加工贸易出口，让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

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季，将开始第三次对内开放，竞争力将创造生产力。新一轮对内开放，要鼓励竞争力的提升。实体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来自具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对内开放，首先要释放民营企业的潜力。如果对内也来一个负面清单，让民营企业享受与自贸区中外资一样的待遇，相信许多行业和领域都会焕发出新的增长动力。

报告实录

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第二季，未来的故事更精彩。那么，未来的中国经济有什么故事呢？为什么这些故事会更精彩呢？

中国经济的前30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第二季的中国经济要打造的是升级版。第二季的经济和第一季的经济发展应该有很多不同的特征，但是，